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

杨攻研

【内容提要】 伴随近年来海外投资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影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新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何种冲击至今仍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据。作者利用 2005—2019 年的全球样本实证研究了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分歧显著增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中,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地方国有企业;而且相较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对于外交关系的冲击尤为显著。一方面,国际经济权力对比的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引致发达国家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经济根源,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赶超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权力转移使原有的自由市场秩序开始让位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差异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同样助推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效应的产生。研究结论为全面评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交影响以及反思传统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间冲突理论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海外投资;国有企业;联大投票;中国外交;工具变量法

【作者简介】 杨攻研,辽宁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沈阳 邮编:110136)。

【中图分类号】 D815 F8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2) 03-0092-28

^{*} 本文是 202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热潮如何重塑国家间政治?自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中国资金在国有企业的引领和推动下涌出国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增长,2016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20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超过2.3万亿美元,总体规模达到历史高点。^①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执行人,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然而,面对中国海外投资热潮,发达国家似乎并未做好准备,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大国竞争加剧,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和并购活动往往被发达国家认为是国家意志和大国雄心的展现并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味。欧盟不断加强投资审查机制遏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甚至寻求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强力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正在超越经济领域,不断冲击着国家间政治和外交。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政治影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新议题。海外大型项目往往被认为是大国参与全球事务和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以提升大国影响力并能够改变国家间关系。然而,在大国竞争时代,中国海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至今仍没有清晰的答案,本文尝试利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回答这一问题。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外交关系的冲击,为全面客观评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交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也初步阐述了当今大国竞争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互动的基本特征。此外,本文进一步挖掘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产生的机理,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形成了对传统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间冲突理论的新拓展。

二 文献综述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家间经贸往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重要议题。中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贸易的角度展开,认为国家间贸易繁荣显著提高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贸易对双方所产生

^① 《“十三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翻番去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18.3%》,http://www.gov.cn/xinwen/2021-01/30/content_5583692.htm,访问时间:2021年4月20日。

的收益显著增加了国际冲突的机会成本,因此国际贸易能够有效抑制国际冲突的发生,为地区带来长久的和平,该观点甚至可追溯至数个世纪以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①与之相反,也有学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国家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意味着交往的密切,这增加了偶发性冲突爆发的机会,历史上的战争与冲突往往发生在高度相似而且紧密联系的群体之间。^②

基于国际投资视角实证研究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文献相对稀少。马克·加西奥罗夫斯基(Mark J. Gasiorowski)首次讨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冲突的关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微弱的正向关系。^③但随后的研究显示,一国对另一国投资的增加能够显著减少国家冲突,带来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④如玛吉特·巴斯曼(Margit Bussmann)的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也像国际贸易一样显著影响国家间政治关系,她利用1980—2000年跨国样本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国资本流入和投资存量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国际冲突发生的风险,支持了“商业和平论”。^⑤究其根源,主要机制可解释如下: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为一国提供了关于其竞争对手的国家能力、决心等信息,消除了两国谈判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理论分析还断言,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也带来了更高的国际冲突成本,促使一国采取更加温和的外交政策。相比贸易联系,两国之间的投资纽带破裂带来的成本更加高昂。^⑥李勋(Hoon Lee)和莎拉·麦克劳克林·米切尔(Sara McLaughlin Mitchell)重点关注了对外直接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World Politics*, Vol.52, No.1, 1999, pp.1–37;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Hailay Gebretinsae Beyene,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Its Effect on Interstate Conflict: The Case of the East African Re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 Vol.35, No.4, 2014, p.25。

②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8页;J. Tyson Chatagnier and Kerim Can Kavakh, “From Economic Competition to Military Combat: Export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1, No.7, 2015, pp.1510–1536。

③ Mark J. Gasiorowsk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om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1, 1986, pp.23–38。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 Richard Rosecrance and Peter Thompson,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 No.1, 2003, pp.377–398; Hoon Le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2, 2010, pp.143–153;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4, 2003, pp.561–586。

⑤ Margit Bussman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2, 2020, pp.143–153。

⑥ Mark Souva and Brandon Prins, “The Liberal Peace Revisited: Democracy,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Initiation, 1950–1999,”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2, No.2, 2006, pp.183–200。

投资和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领土争端事件,对于两个已经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双边投资量的增长也有助于防止冲突升级和开展危机管控,其根源在于争端的机会成本由于投资合作而提高。^①还有学者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冲突(而非国家间冲突)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显著缓解国内冲突的风险,但初级产品部门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则起到相反的作用。^②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中国学者集中讨论了区位选择、投资动机、投资风险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相关问题。^③对于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频遭遇的“政治化”问题,王碧珺和肖河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发现,“投资威胁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是最普遍的理由,但其背后掺杂着商业竞争和国内政治等因素。^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康灿雄(David C. Kang)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加而日渐增强。^⑤对于中国海外投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近年来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足迹遍及东南亚,显著增强和扩大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⑥毛维准对于中国—东南亚基建合作进行的分析显示,这些海外基建倡议和项目实施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力度、地区安全架构参与、主体行为互动、地区影响力施展和大国竞争烈度等都造成了一定影响。^⑦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以及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人则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

① Hoon Lee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6, No.4, 2012, pp.675-703.

② Andreea S. Mihalache-O’Keef, “Whose Greed, Whose Grievance, and Whose Opportunity?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n Internal Conflict,” *World Development*, Vol.106, 2018, pp.187-206.

③ 具体可参见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108—130页;韩剑、徐秀军《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135—154页;毛其淋、许家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第3—21页;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第160—173页;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载《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第53—76页。

④ 王碧珺、肖河《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106—128页。

⑤ David C. Ka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⑥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No.4, 2018, pp.85-127.

⑦ 毛维准《大国海外基建与地区秩序变动——以中国—东南亚基建合作为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96—122页。

及“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海外影响力,^①但杨攻研等研究发现海外投资并未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②此外,王碧珺等聚焦于中国海外投资对东道国安全形势的影响,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③

综上所述,对于相互依赖与国家冲突这一极具争议的命题,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国际贸易展开讨论,对于国际投资的关注远远不足。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规模激增并重塑着原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为从投资视角深入研究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间政治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已有针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文献多围绕经济问题展开,近年来相关研究边界开始拓展至政治维度并进行理论分析,如杨攻研等利用2015年之前的数据初步实证发现了中国资源型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投资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存在差异。^④然而,伴随大国竞争时代的来临,更具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外交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国有企业不同的投资模式又会引致东道国何种不同的外交回应?国有企业投资对于外交关系的冲击展示出怎样的时空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背后存在着哪些深层次的作用机理?至今仍未有文献对上述一系列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命题进行系统性的讨论。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命题进行研究。

三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外交关系的理论机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大规模海外投资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米兰·巴比奇(Milan Babic)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和国家

^① G. John Ikenberry and Darren Lim,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unter-Hegemony,”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4/chinas-emerging-institutional-statecraft.pdf>,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日; David Lewis, “Inroads into Eurasia,”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16-10/inroads-eurasia>,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日。

^② Gongyan Yang, et al., “Money Talks?: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Boo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9, No.1, 2020, pp.202-226.

^③ 王碧珺、杜静玄、李修宇《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134—154页。

^④ Gongyan Yang, et al., “Money Talks?: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Boom,” pp.202-226.

资本的崛起日益挑战人们原有的对于主权和国家权力的认知。^① 在传统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主体(较少涉及投资)往往被同质化,不同企业主体的经贸活动被视为没有本质区别,理论分析框架最重要的逻辑支撑即为经贸往来的收益大大增加了国家之间冲突的机会成本。然而,当考虑到市场参与者为国家力量嵌入其中的国有企业时,机会成本不再成为影响各国政治家决策的关键变量,国家间的权力政治与国家竞争可能压倒经济利益而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使得传统理论的解释力显著弱化。

(一) 国有企业身份与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

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在国际领域的重要载体。既有研究对国有企业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国家内部(如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等)。伴随国有企业走出国门,人们普遍预期其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使得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成为截然不同的行为体。史蒂文·格洛伯曼(Steven Globerman)和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与母国政府的隶属关系和紧密的政治关联使其在通过海外投资进入他国市场时,东道国的政府及民众并不仅仅将其当作纯粹的商业实体,而是视为政治行为体或母国政治体系的一部分。^② 此时,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国际化战略背后的市场化因素被忽视。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在东道国受到更加严格的政治和安全审查,监管机构不断揣测投资背后的政治动机,营利性的商业投资行为被政治化,进而造成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波动。^③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更具特殊性。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增进国家财富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依托。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度开放并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中国成为

^① Milan Babic, et al.,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State Capital: State-L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7, No.3, 2020, pp.433-475.

^② Steven Globerman and Daniel Shapiro, "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Surrounding Chinese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6, No.1, 2009, pp.163-183; He Wei and Marjorie A. Lyle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siness Horizons*, Vol.51, No.6, 2008, pp.485-491.

^③ Yuan Yi Chen and Michael N. Young,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 Principal-Principal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7, No.3, 2010, pp.523-539; 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 "Corporate Ownership, Equity Risk and Retu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7, No.7, 2008, pp.1149-1168.

自由开放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然而,安东·马尔金(Anton Malkin)指出“尽管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但是仍然处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安全框架之外。如果我们承认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是由美国的军事力量所支撑的,那么无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以增强中国军事实力为明确目标,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结构性权力的挑战”^①。这种观点背后的考量诱发了各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向。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与传统理论的预期不同,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海外投资规模的增长将诱发东道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推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外交分歧加剧。

(二) 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的异质性

国有企业不同的投资模式也可能造成东道国不同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影响,进而带来不同的外交回应。企业的投资模式可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本地区生产能力的扩张、快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显而易见的收益,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②相较于绿地投资,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却可能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和合法性危机。企业跨国并购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收购方企业获得东道国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认可和接纳。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跨国并购通常在东道国的媒体以及政治讨论中具有更高的曝光率,又会在短期内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并遭到民众和工会的抵制。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通常具有技术寻求的目的,并购目标多是母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科技行业或科技类资产,或者能源、电力等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因此更容易引起东道国的关注甚至担忧。

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此类支持是把双刃剑,在赋予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竞争力的同时也会导致东道国将其视为不公平竞争行为,投资活动被视为本国经济的一股破坏性力量,进而出台更加严格的监管政策,或以“国家安全”为名针对特定行业(如资源、能源和科技等)颁布国家安全法,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由此面临更大的制度性压力。以美国为例,美国投资委员会

^① Anton Malkin, “The Made in China Challenge to US Structural Power: Industrial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OI: 10.1080/09692290.2020.1824930.

^② Steven Globerman and Daniel Shapiro, “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Surrounding Chinese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63-183; Karl P. Sauvant, “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Emerging Markets? The Case of China,” in Karl P. Sauvant, Wolfgang A. Maschek and Geraldine McAllister,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rom Emerging Marke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359-380; Dean Xu and Oded Shenka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7, No.4, 2002, pp.608-618.

往往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采取差异化的态度,来自其他国家的企业对本土企业进行并购时,交易将会受到极为严格的安全审查,而绿地投资很少受到特别关注。^①面对他国国有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并购浪潮,东道国民众以及利益集团共同推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抬头,该国政治家在选举政治的夹裹之下可能扭转本国的外交政策,针对投资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立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同模式将引致东道国不同的外交回应。绿地投资具有更低的政治敏感性,而跨国并购将对外交关系产生更大冲击。

(三)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负面外交效应产生的根源

中国作为政治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的大国,国有企业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执行者,中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不断融入欧美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中国在技术领域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欧美的竞争性明显增强,并带动了国际经济权力和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国有企业在科技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时,东道国政府不仅担心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获取,更加担忧此类技术通过国有企业最终被母国政府所掌控。在它们看来,在国家力量的干预下,国有企业之间更容易进行新技术的共享(尤其是军事方面),进而增强母国的经济及军事实力以实现政治目标。^②此时,资本流入为东道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被完全忽视,国家竞争与权力政治成为政治家考虑的首要问题,外交分歧不断加剧甚至可能走向冲突与对抗。

如今中国国有企业主导之下的海外投资热潮已经引发发达国家对安全及其主导地位的担忧,成为这些国家内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以及政治家安抚国内民众的借口,给双边外交关系带来强力冲击,数年前大行其道的“中国威胁论”和近年来盛行的“中国冲击论”即为例证。面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不断攀升,发达国家开始以“不公平竞争”和“国家安全”为由寻求利用新的国际规则限制和削弱中国。各国开始纷纷收紧本国的投资审查制度,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安全审查尤为严格。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容,七国集团(G7)成员国相继出台了外商投资政策新标准。^③

^① Karl P. Sauvant, "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Emerging Markets? The Case of China," pp.359-380.

^② Klaus E. Meyer, et al., "Overcoming Distrust: How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apt Their Foreign Entries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bro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5, No.8, 2014, pp.1005-1028.

^③ 张宇燕《全球投资安全审查趋紧,国际投资格局面临重构》,载《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第1期,第8页。

在此背景下,各国对华态度与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大幅度转变,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为重要标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规锁”与“反规锁”的矛盾更为突出。^①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3: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外交影响源于中国科技领域的赶超及其带来的大国间经济权力对比的深刻变化、政治体制的差异及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四 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说明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外交立场的差异作为双边外交关系的代理变量,利用各国在联合国大会(联大)的投票行为测算各国总体的国家外交立场。联大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和政策制定机关,可就全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采取行动,具体涉及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权、裁军、恐怖主义、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性别平等、施政及粮食生产等。联大的每个会员国都有一票投票权,可投“赞成”“反对”和“弃权”票。在这一制度下,联大投票可以被看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集体行为,也可以被视为绝大多数国家就世界性议题的利益集中表达。对联大投票多个议题、多国家、长时段的观察能够发现多数国家的基本外交立场和外交政策变化。^②联大多样化的议题和每年所举行的多次会议及详尽的投票记录数据为我们提供了量化各国外交政策的极佳数据基础。

就如何使用联大投票数据刻画各国的外交政策,多数学者使用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所提出的“S值”方法计算两国的投票相似度并以此衡量双边政治关系或外交政策的相似程度。^③然而,这一衡量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两国投票相似度不仅受到两国外交政策偏好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大会的议题选择。因此,迈克尔·贝利(Michael A. Bailey)基于各国的投票行为使用动态有序空间模型(dynamic ordinal

^① 规锁是指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通过重新塑造国际制度以求规范和约束中国。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② Erik Voeten,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2, 2002, pp.185-215.

^③ Erik Gartzke,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 No.1, 1998, pp.1-27.

spatial model) 这一先进的统计方法更加准确地估计了各国的基本外交立场,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外交政策理想点(state ideal points),它能够排除诸多干扰因素并准确识别出一国在国际事务中整体的外交政策偏好,同时也可以进行横向(国家之间)和纵向(时间维度)的对比。^① 本文使用上述方法所得的外交政策理想点指标,进一步计算出随时间变化的中国—东道国之间外交政策理想点的差异,以此来衡量两国的外交分歧或双边政治关系。

考虑到外交分歧或双边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本文进一步从政治事件的角度进行衡量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等学者在实证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时,利用从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GDELT)中抽取的负面政治事件作为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② 两国一年中所发生的负面政治事件越多,通常说明两国的政治关系越差,外交分歧也越大。全球事件话语数据库是迄今为止覆盖最广的国际关系事件数据库,数据来源包括100多种语言的媒体报道。对于所搜集到的全球海量事件记录,该数据库按每个事件的性质将其分成20类,并将事件分为积极的正面事件和消极的负面事件两种类型。该数据库中所记录的事件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参考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等学者的做法,本文将事件聚焦于东道国政府参与的政治事件以及军事事件,以更准确地衡量双边政治或外交关系,剔除其中可能与政治无关的诸多其他类型事件的干扰。此外,更加积极的政治关系也可能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增加。为有效降低反向因果关系和模型内生性,本文参照既有研究将东道国针对中国的负面政治或军事事件作为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③ 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中国自2005年以来单笔超过1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包括企业名称、东道国、投资产业及投资额等。该数据库具有两个优点:第一,数据更加真实可靠。该数据库所记录的项目信息均为已经得到证实的实际落地的投资项目,有效规避了部分企业以对外投资为名利用海外离岸中心进行资本运作的虚拟投资问题。相比现有其他数据库,该数据库

^①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1, No.2, 2017, pp.430-456.

^② Christina L. Davis, Andreas Fuchs and Kristina Johnson, "State Control and the Effects of Foreign Relations on Bilateral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3, No.2, 2019, pp.405-438.

^③ 笔者根据中国投资项目数据整理得到,原始数据参见"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访问时间:2021年2月2日。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第二,该数据库针对每一个投资项目,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记录,不仅包括投资金额,还包括投资的细分行业、投资方式以及具体的投资地点等,能够从多维度详细刻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全貌,为后续的量化分析提供更加丰富的指标。

对于该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通过对所有海外投资的企业进行逐一检索,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属性,确认公司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对于多家公司的合作项目,本文对其进行拆分:如果项目信息中记录了各个公司对于该项目的出资比重,则按照这个比重将总投资额进行分配;如果没有记录出资比重,则假设各个公司的投资比重相同并将总投资额进行分配。同时,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97家中央国有企业名录,对所有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并加总,^①进而整理出中央国有企业投资和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此外,根据每个投资项目所记录的投资模式,再次将其分为绿地投资项目和跨国并购项目,随后加总得到中国国有企业对某国的绿地投资总额和跨国并购总额,最终不仅得到中国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投资额,同时也得到中央国有企业投资额和地方国有企业投资额、中国国有企业绿地投资额和跨国并购总额。

基于上述指标,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的相关性进行初步观察:利用全样本对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在95%的置信区间进行线性拟合,以初步观察二者的相关性。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额,纵轴则代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从趋势可以初步判断,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额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之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额的增加,中国与东道国外交立场的差异也越大。但这仅仅代表了二者的相关性,而非准确的因果关系,因此仍需在下文中进行更为精确的计量分析。

(二) 基于假设的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本文参考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等人的研究,^②相应的计量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① 《央企名录》, <http://www.sasac.gov.cn/n4422011/n14158800/n14158998/c14159097/content.html>, 访问时间:2021年6月2日。

^②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 Pevehouse, "Institutions,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Gerald Schneider, Katherine Barbieri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eds., *Globalization and Armed Conflic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233-250;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1, 2007, pp.166-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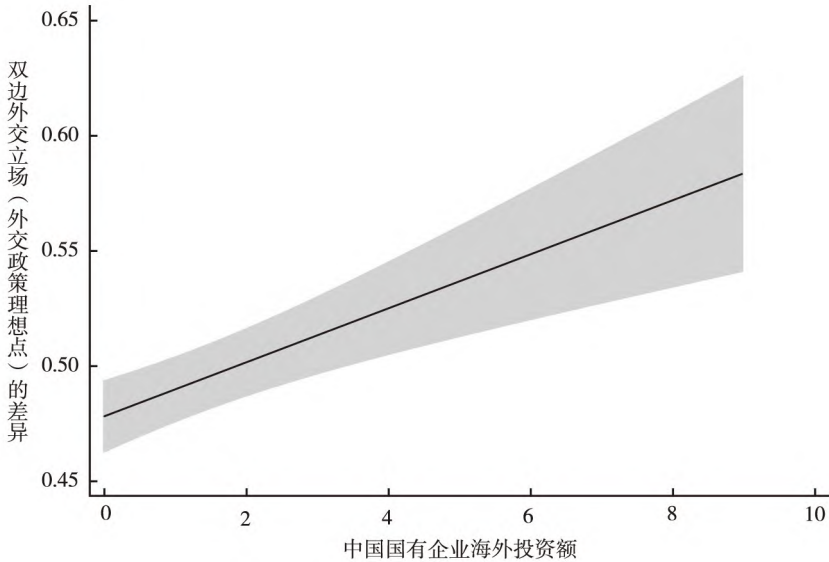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的拟合图(95%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IPD_{i,t} = \alpha_0 + \alpha_1 SOE_Invest_{i,t-1} + \alpha_2 X_{i,t-1} + \mu_i + \delta_{i,t} \quad \text{式 1}$$

$$IPD_{i,t} = \alpha_0 + \alpha_1 CSOE_Invest_{i,t-1} + \alpha_2 LSOE_Invest_{i,t-1} + \alpha_3 X_{i,t-1} + \mu_i + \delta_{i,t} \quad \text{式 2}$$

$$IPD_{i,t} = \alpha_0 + \alpha_1 Greenfield_Invest_{i,t-1} + \alpha_2 M\&A_Invest_{i,t-1} + \alpha_3 X_{i,t-1} + \mu_i + \delta_{i,t} \quad \text{式 3}$$

$$IPD_{i,t} = \alpha_0 + \alpha_1 SOE_Invest_{i,t-1} + \alpha_2 SOE_Invest_{i,t-1} \times Variable_{i,t} + \alpha_3 X_{i,t-1} + \mu_i + \delta_{i,t} \quad \text{式 4}$$

其中 i 表示国家, t 表示年度。被解释变量 $IPD_{i,t}$ 表示第 i 国在 t 时期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 该数值越大意味着两国的外交立场差异越大, 即该国与中国的外交分歧也越大。首先, 利用式 1 和式 2 对假设 1 进行检验,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SOE_Invest_{i,t-1}$, 即为 $t-1$ 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对第 i 国的投资额(对数值); 核心解释变量 $CSOE_Invest_{i,t-1}$ 和 $LSOE_Invest_{i,t-1}$ 则分别代表取对数之后的中央国有企业投资额和地方国有企业投资额。其次, 利用式 3 对假设 2 进行检验,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Greenfield_Invest_{i,t-1}$ 和 $M\&A_Invest_{i,t-1}$ 分别代表取对数之后的国有企业绿地投资额和跨国并购额。最后, 利用式 4 对假设 3 进行检验, 其中变量 $Variable_{i,t}$ 代表相关的理论机制变量。上述模型中, $X_{i,t-1}$ 即为其他对两国外交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代表固定效应, $\delta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在计量分析过程中,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不可避免地可能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结果偏误,难以有效识别国有企业投资与外交立场差异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潜在的内生性来源之一可能是遗漏变量问题,即存在某些影响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的因素未能纳入计量模型。对此,参照以往研究,本文尽可能将理论上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或双边政治关系有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以控制某些可能同时影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不可观测的因素,以应对遗漏变量难题。具体做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引入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随国家变化但随时间而变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多个不随时间变化但随国家变化的国家特征变量(如多个地理变量),进而达到双向固定效应的效果,提高估计的有效性。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额与双边外交关系之间可能还会存在双向因果的问题,对此,本文将所有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在理论上第 t 期的外交关系无法对前一期(第 $t-1$ 期)的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额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互为因果的问题。同时,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IV)这一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处理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再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IPD_{i,t} = \alpha_0 + \alpha_1 SOE_Invest_{i,t-1} + \alpha_2 X_{i,t-1} + \mu_i + \delta_{i,t} \quad \text{式 5}$$

$$SOE_Invest_{i,t-1} = \alpha_1 IV_1 + \alpha_2 IV_2 + X_{i,t-2} \Gamma + \psi_t + v_i + \varepsilon_{i,t-1} \quad \text{式 6}$$

参考既有研究,控制变量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等维度选取:(1) 双边贸易依赖度,即利用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进口与出口总额之和)占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根据贸易和平论或贸易冲突论,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对国家间政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将其纳入模型。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①,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②。(2) 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通常而言,政治体制往往与国家利益的界定、外交政策偏好显著关联,进而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同样需要控制其影响,本文利用“政体 5”数据库(The Polity 5 Project)中东道国与中国政治体制综合得分的绝对差值进行衡量^③。(3) 基因距离,用以衡量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在讨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时,这一变量往往被人忽略,阿尔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0日。

②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0日。

③ “The Polity 5 Project,”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0日。

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人指出,一国的文化传统不仅塑造了自身的外交传统和国际政治理念,还意味着在全球治理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对自身的不同定位,^①可能导致两国对相关国际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进而影响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因此同样需要控制其影响。数据来源于恩里科·斯波劳雷(Enrico Spolaore)和罗曼·瓦齐亚格(Romain Wacziarg)。^②(4)东道国是否为产油国。以石油为代表的战略资源强有力地影响着国家间政治。为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多数国家更倾向于与产油国保持稳定的政治关系,因此需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③(5)地理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度差异、纬度差异、两国是否接壤以及是否拥有共同水域等)。既有研究表明,地理距离的远近以及相对空间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程度以及对彼此的战略意义,进而影响两国的外交策略和外交立场,因此我们将其纳入分析。该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蒂里·迈耶(Thierry Mayer)、索莱达·齐格戈(Soledad Zignago)和奥梅尔·奥扎克(Ömer Özak)等学者。^④(6)东道国是否为主导型大国。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国家可能转变原有的外交战略,进而带来双边外交关系的新变化,为此,通过引入该变量以控制这一因素的影响。该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W)。^⑤(7)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程度加剧,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改变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而对中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产生冲击。这一变量在以往实证研究文献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为使模型能够准确描述当今的时代特征、增强模型解释力,本文将其引入分析。该变量的数据根据联大投票数据测算得到(见表1)。

① Alberto Alesina and Paola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5, No.4, 2015, pp.898-944.

②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War and Relatednes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8, No.5, 2016, pp.925-939.

③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War and Relatedness," pp.925-939.

④ Thierry Mayer and Soledad Zignago, "Notes on CEPII's Distances Measures: The GeoDist Database," CEPI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11-25, Research and Expertise on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December 2011; Ömer Özak, "Distance to the Pre-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Fronti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23, No.2, 2018, pp.175-221.

⑤ 主导型大国是指在国际体系中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具有重要影响力和领导力的国家,一国是否属于主导型大国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具体可参见"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0日。

表 1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外交立场差异	2695	0.4934	0.3660	0	1.5481
核心解释变量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	2988	1.1987	2.6411	0	10.6700
	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	2984	0.8682	2.2872	0	10.6700
	地方国有企业投资	2984	0.2769	1.2989	0	8.3022
	私有企业海外投资	2988	0.7083	2.0383	0	10.7709
	国有企业跨国并购	2988	0.8681	2.3129	0	10.6700
	国有企业跨国绿地投资	2988	0.5084	1.7641	0	9.6800
控制变量	政治体制差异	2239	11.2669	5.7753	0	17.0000
	贸易依赖度	2147	1.9449	2.3514	0	12.7771
	基因距离	2640	1430.0092	692.8801	122.5400	2993.2922
	是否为主导型大国	2685	0.0341	0.1800	0	1.0000
	是否为产油国	1770	0.0932	0.2908	0	1.0000
	与美国的双边政治关系	2695	0.2812	0.1702	0	1.0000
	地理距离	2655	9.0103	0.5313	6.6959	9.8682
	经度差异	2610	4.3048	0.8171	0	5.1868
	纬度差异	2625	2.8500	0.9207	0	4.3313
	国土是否接壤	2655	0.0789	0.2703	0	1.0000
是否拥有共同水域	2640	0.0281	0.1661	0	1.00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统计。

五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外交关系的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数据和计量模型对前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集中回答三个问题:首先,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外交立场更加趋同还是分歧增加,同时上述影响又具有何种时空特征?其次,不同的投资模式是否导致外交影响的显著变化?最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影响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一)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理想点差异

对假设 1 的验证结果如表 2 所示。首先,在列(1)中即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进行单变量回归,初步判断二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高

度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规模与两国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显著正相关。但由于控制变量的缺失,这一估计系数并未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效应。随后在列(2)添加所有控制变量再次进行检验,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值,且显著水平仍维持在1%;与此同时,私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为正值,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和私有企业海外投资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影响: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外交理想点差异显著增加,双方的外交分歧不断扩大。

中国海外投资热潮对于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和话语权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使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可能掩盖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对表2列(3)和列(4)中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样本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且相比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系数的大小也随之提高。但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但并不显著,并且估计系数大小明显下降。同时,私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并未在发展中国家找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双边外交关系的证据,但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显著放大了双边外交分歧,即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产生的外交影响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

对于控制变量,当东道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越高时,在外交领域该国表现出与中国更高的相似性,即该国倾向于与中国建立更加融洽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贸易依赖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论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①但在发达国家样本组,其显著性仅为10%。政治体制差异这一变量在发达国家样本组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应:在发达国家中,政治体制差异显著增加了其与中国的外交分歧,成为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制约因素之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群体,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却能够求同存异推动国际政治合作。值得关注的是,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显著制约着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一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越密切,与中国的外交分歧就越大;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奇迹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带来了

^①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pp.1-37; Morrow James, "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481-489.

更加显著和直接的溢出效应。对于基因距离变量,有研究发现,整体基因距离越小的国家之间冲突发生的概率也更大,冲突往往发生在相似的族群间,本文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①在发达国家群体中,相比非主导型大国,中国与主导型大国之间存在着更大程度的外交协调。此外,地理因素同样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与外交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假设1得以证明: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对发达国家海外投资规模的增长将诱发东道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推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外交分歧的加剧。

表2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理想点差异

	(1)	(2)	(3)	(4)
变量名	全样本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119*** (0.0031)	0.0067*** (0.0023)	0.0073*** (0.0026)	0.0027 (0.0028)
私有企业投资额		0.0046 (0.0031)	0.0030 (0.0028)	-0.0034 (0.0047)
双边贸易依赖度		-0.0260*** (0.0098)	-0.0326* (0.0180)	-0.0254** (0.0100)
政治体制差异		0.0026* (0.0016)	0.0178*** (0.0042)	-0.0062*** (0.0017)
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		1.5074*** (0.0716)	1.5522*** (0.0748)	0.0233 (0.1750)
东道国是否为主导型大国		-0.0426 (0.0312)	-0.1240*** (0.0361)	-
东道国是否为产油国		-0.0124 (0.0282)	0.0498 (0.0682)	0.0395 (0.0316)
基因距离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常数项	0.5663*** (0.0266)	2.6594*** (0.2103)	3.0577*** (0.2839)	1.0694*** (0.3876)

^①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War and Relatedness," pp.925-939.

续表 2

	(1)	(2)	(3)	(4)
变量名	全样本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地理控制变量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固定效应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观测值	2504	1223	444	779
R ²	0.0181	0.6854	0.8432	0.152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的值为 t 值。地理控制变量包括地理距离、经度差异、纬度差异、两国是否拥有共同水域、领土是否接壤,囿于篇幅未汇报上述变量的估计结果,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二) 基于国有企业类型和投资模式的检验

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再细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两种类型。王碧珺指出,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在讨论投资问题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①中央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在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比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更加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②因此,在前文结论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所产生的外交影响是否相同。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央企名录》,本文对数据库中所有进行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一一进行识别,随后再次利用前文的计量模型在添加全部控制变量之后进行实证检验。

估计结果如表3列(1)至列(3)所示。列(1)为使用全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央国有企业投资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地方国有企业投资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影响,中央国有企业投资带来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分歧的增加,地方国有企业并没有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显著影响。随后,表3在列(2)和列(3)中进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的对比,结果发现,中央国有企业投资的估计系数仅在发达国家样本组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显著,该结论与前

^① 王碧珺《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第61—74页。

^②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http://www.gov.cn/xinwen/2017-01/18/content_5160910.htm#1,访问时间:2021年6月2日。

文在逻辑上保持高度一致。

根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详细记录信息,将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划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并实证检验不同投资模式影响的差异。在估计过程中,同样添加所有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列(4)至列(6)所示。列(4)的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即伴随中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规模的增加,两国外交政策理想点的差异也随之提升;但绿地投资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绿地投资并未对中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随后,根据列(5)和列(6)的估计结果可知,跨国并购的影响同样仅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中,在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中其影响并不显著。

综合上述结论,前文所提出的假设2得以证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同模式将引致东道国不同的外交反应,绿地投资模式政治敏感性更低,而跨国并购对外交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冲击。

表3 不同投资主体和投资模式的异质性影响

	(1)	(2)	(3)	(4)	(5)	(6)
	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对比			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对比		
变量名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央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84*** (0.0026)	0.0073** (0.0030)	0.0037 (0.0032)			
地方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27 (0.0036)	0.0041 (0.0038)	0.0021 (0.0056)			
国有企业跨国并购				0.0072*** (0.0025)	0.0082*** (0.0028)	0.0015 (0.0031)
国有企业绿地投资				0.0033 (0.0034)	-0.0024 (0.0039)	0.0043 (0.0037)
私有企业投资额	0.0020 (0.0030)	0.0021 (0.0029)	-0.0050 (0.0048)	0.0042 (0.0032)	0.0034 (0.0027)	-0.0037 (0.0048)
控制变量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固定效应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观测值	1223	444	779	1223	444	779
R ²	0.6852	0.8431	0.1533	0.6851	0.8443	0.152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的值为t值。列(1)至列(6)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均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囿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三)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影响的时空特征

在全球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应分地区和分时期对其进行再考察。对于不同地区的对比(以东亚地区为例)具体做法如下:首先,设定东亚地区哑变量,即当某国家或地区属于东亚地区时,该变量等于1,否则等于0。随后,将地区哑变量与国有企业投资的交乘项(东亚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引入计量模型,交乘项(东亚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为:相对于其他地区,当国有企业对东亚地区进行投资时,其对双边外交关系影响的差异。

实证结果如表4列(1)所示,在添加交乘项之后,核心解释变量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这表明前文得到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交乘项(东亚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为负值,但并不显著。该结果说明,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中国—东亚各国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这种差异并未找到足够的统计学上的证据。随后,再次以相同的方法对美国 and 欧洲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如表4列(2)所示,交乘项(欧美国国家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值。这说明在欧美国家,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对于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冲击,伴随中国国有企业对欧美国家投资规模的增长,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分歧以更快的速度扩大。最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为非洲地区),交乘项(其他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同样为负值但并不显著,该结论与东亚地区较为相似。综上,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外交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在欧美地区,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加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外交分歧的出现。

表4 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

	(1)	(2)	(3)
变量名	东亚地区	欧美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东亚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62 (0.0061)		
欧美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104*** (0.0037)	
其他地区 \times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61 (0.0054)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74*** (0.0024)	0.0041 (0.0027)	0.0082*** (0.0025)

续表 4

	(1)	(2)	(3)
变量名	东亚地区	欧美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私有企业投资额	0.0047 (0.0031)	0.0046 (0.0031)	0.0045 (0.0031)
控制变量	添加	添加	添加
固定效应	添加	添加	添加
观测值	1223	1223	1223
R ²	0.6852	0.6861	0.685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括号内的值为 *t* 值。列(1)至列(3)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均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囿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内(2005—2019年),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新一轮重构期。门洪华指出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亚投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付诸实践给守成大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①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关系的互动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利用前文的计量模型同样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再次进行分时期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仅为0.0037,并且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投资额的估计系数上升至0.0065,统计上的显著性升至1%的水平。由此可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并未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外交关系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有企业活跃的海外投资活动与欧美经济体乏力的复苏形成鲜明对比,在各国选举政治的鼓动下,经济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思潮开始蔓延,中国成为各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欧美发达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造成了双方更程度的外交分歧。

六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外交关系的机理检验

(一) 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希望有效识别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之间的因果

^① 门洪华《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20—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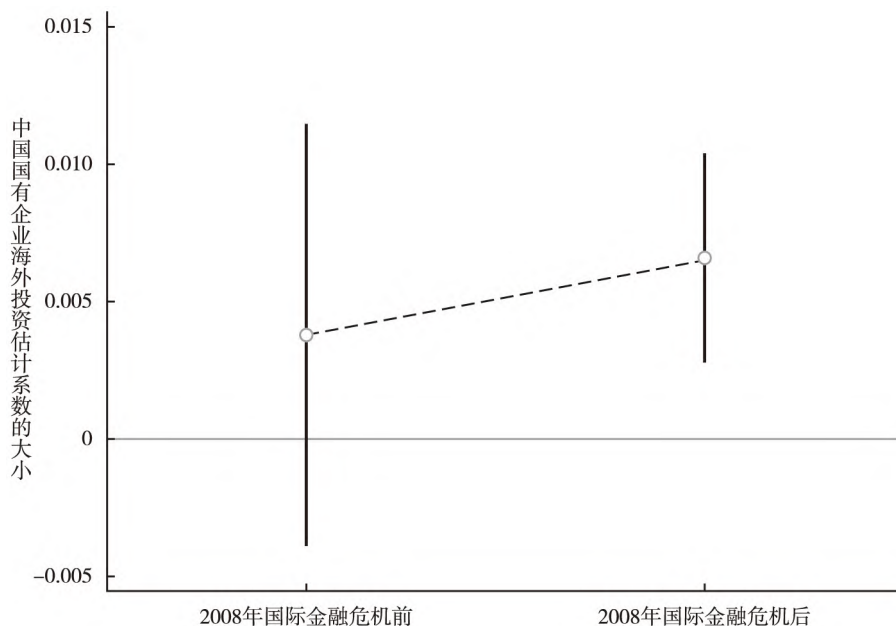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影响的差异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关系,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可能使我们无法得到稳健的结论或仅仅得到二者的相关性。在讨论经贸往来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这一议题时,内生性通常有两个来源:一是反向因果问题,即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可能带来双边政治氛围的变化,但双边政治关系的冷暖同样会造成经贸往来的波动;二是遗漏变量问题,实证模型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控制变量,进而无法有效识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真实影响。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通过如下方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在前文模型设定过程中,通过滞后期来减少双向因果问题,并基于既有文献添加丰富的控制变量来减少遗漏变量问题;同时,进一步通过添加固定效应以有效捕捉中国与国外外交关系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最后,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这一处理内生性问题的经典方法再次确定中国国有企业投资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之间的因果关系。^①

有效的工具变量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相关性,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二是

^① 工具变量法的原理是将内生变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与模型中的扰动项相关,另一部分与扰动项不相关,可用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那部分得到一致估计,进而有效识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我们可以借助另外一个“工具变量”实现这种分离。

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参考已有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工具变量选择如下:(1) 2009年中国颁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政策冲击。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通常需要多个部门进行严格的审核。为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2009年3月1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与之前规定相比,该办法一方面大大简化了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对于各级审核均规定了严格的审核时限,改善了审核效率,大幅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审批权和企业更多的投资灵活性(境外投资经济技术可行性由企业自行负责),商务部仅保留了对少数重大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该政策颁布之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激增。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与解释变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密切相关,同时与被解释变量(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成为工具变量的良好选择。(2) 第*i*国在*t*年所吸引的全球所有国家的海外投资总额。当其规模越大时,说明该国由于自然禀赋条件或固有的国家特征对于全球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预期中国国有企业同样会以更高的概率投资该国,但该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同样没有直接相关性,因此也将其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工具变量之一。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UNCTAD)。^①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实现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这说明,总体上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热潮引起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更大的外交分歧,在控制了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处理内生性之后,仍然可知,国有企业投资确实是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增加的原因之一。从列(2)和列(3)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可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中,由估计系数的大小可知,国有企业对该国的投资额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双边外交政策理想点的差异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0.38%。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无论是从统计的显著性还是经济的显著性来看,影响均远小于发达国家。表5最后一行关于工具变量有效性的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工具变量是有效的,限于表格篇幅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进行汇报。总体而言,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与前文所得到的结论高度一致。

^① “UNCTAD STAT,”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About.html>,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日。

表5 利用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

	(1)	(2)	(3)
变量名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520 ^{***} (0.0099)	0.0384 ^{***} (0.0118)	0.0161 [*] (0.0092)
私有企业投资额	-0.0129 ^{**} (0.0053)	-0.0128 ^{**} (0.0055)	-0.0087 [*] (0.0049)
常数项	3.2261 ^{***} (0.3262)	2.8864 ^{***} (0.4256)	0.9880 ^{***} (0.2704)
控制变量	添加	添加	添加
观测值	1112	384	728
KP F 统计量	55.1174	24.0082	35.4654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40.4382	9.8661	29.214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的值为 t 值。列(1)至列(3)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均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囿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由于国家间外交关系量化的复杂性,本文再次使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负面政治事件这一新指标来替代被解释变量,对前文结论重新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在列(1)中利用全样本检验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它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即伴随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负面的政治事件也显著增加,双边外交关系趋冷。其次,在列(2)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央国有企业投资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地方国有企业的影响却不显著。这意味着对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影响的产生,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增长加剧了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分歧,对外交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地方国有企业则不然。最后,对于前文提到的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差异,在列(3)中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高度显著为正,但国有企业绿地投资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跨国并购显著增加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负面政治事件,导致外交关系的波动,而绿地投资对于外交关系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即使在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之后,前文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利用国家间的政治事件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再检验

	(1)	(2)	(3)
被解释变量: 政治事件	国有企业投资	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对比	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对比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895 *** (0.0302)		
中央国有企业投资额		0.0800 ** (0.0335)	
地方国有企业投资额		0.0714 (0.0450)	
国有企业跨国并购			0.0784 *** (0.0282)
国有企业绿地投资			0.0782 (0.0628)
常数项	6.7561 * (3.5836)	6.6484 * (3.5534)	6.7751 * (3.5546)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3	243	243
R ²	0.6942	0.6931	0.6954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的值为 *t* 值。列(1)至列(3)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均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 囿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二)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影响的产生机理

以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为纽带的经济融合何以未能带来更加和谐的外交关系? 在得到基本结论之后, 还需进一步对内在机理进行检验, 以寻找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影响双边外交关系的根源。基于前文分析, 在大国竞争时代, 国家间经济政治竞争及国际权力转移可能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加剧发达国家与中国外交分歧的根源之一。

就国际经济维度而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对世界领先国家的科技赶超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权力转移可能使发达国家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 以往基于市场原则所认为的国际投资合作带来双赢结果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开始让位于国家竞争的战略思维,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接近科技前沿、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因而发达国家以此为抓手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立场、发起对华战略竞争。

对于上述判断, 本文从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权力转移两个方面通过交乘项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一方面, 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交乘项(科技

创新能力×国有企业投资额)引入模型,同时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作为独立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以确保估计过程的严谨性。其中,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距进行衡量,当该指标值越小时,则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与欧美等科技前沿国家的差距越小,数据来源于佩恩表。^①估计结果如表7列(1)所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伴随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与发达国家科技差距的缩小,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于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的影响显著增加,中国在科技领域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推动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做出了更强烈的政治回应,引致了双边外交分歧的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采取相同的方法将中国国际经济权力引入模型进行检验。参照以往的研究,中国国际经济权力以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全球经济总体规模进行衡量,该比例越高,则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也越大。估计结果如表7列(2)所示,国际经济权力与国有企业投资额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伴随中国国际经济权力的增强,面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张,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外交分歧也进一步加大,外交关系更为紧张。科技领域的赶超与国际经济权力的转移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的重要经济根源。

就国际政治维度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近年来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引发负面外交冲击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持续挑战着发达国家所推崇的诸多理念。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和重大战略执行者,发达国家以此作为限制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和体制声誉的重要着力点。类似专门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安全审查、不合理限制等行为势必引发一系列政治连锁反应,带来双边外交关系的波动。对于上述判断,本文同样进行计量检验(见表7)。

表7 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1)	(2)	(3)	(4)
变量名	科技创新	经济权力	政体差异	国际话语权
科技创新能力×国有企业投资额	0.0282*** (0.0094)			

^①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5, No.10, 2015, pp.3150-3182.

续表 7

	(1)	(2)	(3)	(4)
变量名	科技创新	经济权力	政体差异	国际话语权
国际经济权力×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45 ^{***} (0.0013)		
体制差异×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08 ^{***} (0.0004)	
国际影响力×国有企业投资额				0.0219 ^{***} (0.0069)
国有企业投资额	0.0003 (0.0029)	0.0003 (0.0026)	0.0039 [*] (0.0024)	0.0001 (0.0033)
私有企业投资额	0.0065 ^{**} (0.0031)	0.0045 (0.0029)	0.0035 (0.0028)	0.0047 (0.0034)
常数项	2.0068 ^{***} (0.2172)	3.3297 ^{***} (0.5811)	1.8906 ^{***} (0.2172)	1.4158 ^{**} (0.6053)
控制变量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固定效应	添加	添加	添加	添加
观测值个数	1005	1223	1130	1191
R ²	0.7993	0.7824	0.7741	0.789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 值。列(1)至列(4)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均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囿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全部结果均可向笔者索取。

一方面,本文将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体制差异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交乘项引入计量模型。其中,两国政治体制差异的数据来源于“政体 5”数据库。估计结果如表 7 列(3)所示,交乘项(体制差异×国有企业投资额)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这说明当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体制差异越大时,国有企业在该国投资时所引起的负面外交效应也越大。另一方面,在列(4)中,引入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指数和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交乘项。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指数利用联大投票数据进行测度,即利用第 *i* 国在第 *t* 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本国国民生产总值与全球经济总体规模之比作为权重,对所有国家与中国的外交相似度进行加权平均,以此作为中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指数。^① 当该指数越大时,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大。结果显

① 计算公式如下: $index_t = \sum_{i=1}^n s2un_{it} \cdot (GDP_{it} / GDP_World_{it})$ 。

示,该指数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同样高度显著为正,这说明伴随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日渐增长,国有企业投资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引发的发达国家外交政策调整的力度也随之增强。

综上所述,假设3得以证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引致的外交影响源于中国科技领域的赶超及其所带来的大国间国际经济权力对比的深刻变化、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及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七 结论

本文利用2005—2019年全球192个国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及深层次根源。结果显示:在中国海外投资热潮中,伴随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分歧也显著增加。上述效应在欧美地区尤为突出,而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越发显著。同时,这一影响伴随投资主体和投资类型的不同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形:与地方国有企业相比,中央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更可能成为外交分歧扩大的源头,中央国有企业投资额越大,东道国与中国外交政策理想点的差异也越大,但地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跨国并购由于可能引发东道国社会更广泛的关注而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但绿地投资并未产生显著的外交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不断增长不仅没有通过增加与东道国经济的相互依赖而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稳定器与压舱石,甚至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冲击。伴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权力的转移以及后起大国对发达国家全球政治影响力的挑战,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成为外交分歧的助推器,在中国海外投资达到历史峰值之时,中国也遭遇了来自发达国家强烈的负面政治反馈。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中,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时刻牵动着国家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影响。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之际,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如何全面评估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新挑战、如何积极构建经济与政治良性互动发展新格局成为未来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议题。

(截稿:2021年8月 编辑:沈 陈)

The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Yang Gongyan (92)

【Abstract】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tatus as a major overseas investor in recent years ,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has become a continuing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data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2005 to 2019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the foreign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 especiall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impac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entral enterprises from China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oreover , compared with the green space invest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M & A on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 on the one hand , the shift of economic power is the main factor , which leads to the adjustment of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by western countries. The catching up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ensuing transf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wer make the original free market order give way to a political game of great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 the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also boost the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diplomatic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reflect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Key Words】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 state-owned enterprise , UN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 mechanism analysis ,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uthor】Yang Gongyan , Associate Professor ,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conomies and Politics of Transitional Countries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iaoning University.